

云南边境少数民族教育转向的困境与路径

——基于“边境7村”的实证研究^{*1}

张曙晖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边境少数民族的教育始终难以与高度统一的教育体系互融相生,教育转向是必然选择。然而,由于城乡差别,生活方式差异,语言不同,自然人文环境差异的长期存在,实现教育转向存在诸多困境,因此,主动选择、充分发挥边境优势、积极结合国家教育规划是消解困境,实现边境少数民族教育转向的关键。

【关键词】:云南边境;少数民族;教育转向;困境;路径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8)03—0152—05

一、问题的提出

“十二五”时期,边境少数民族的教育发展有了整体提升,边境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发展加快,边境学校建设逐步推进,民族教育有了显著改进,教育公平有了明显提升。然而,由于种种差异的存在,边境少数民族教育仍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影响着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甚至影响着边境安全和社会稳定。新中国建立以来,边境少数民族的教育发展始终高度依赖于统一的中央教育体系,执行教育政策有余而教育创新不明显,边境教育缺乏活力且严重滞后于内地的态势日益明显。因此,充分发挥边境优势,与中央教育政策有机结合,走一条具有边境特色的教育转向之路就成了促进边境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本文以云南边境7村的问卷资料及访谈资料为依据,重点关注边民受教育水平、边民教育观念、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教育质量等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制约着云南边境少数民族教育的转向,成为教育转向的真正困境。本文所指的云南边境7村,都是边境县市的边境村,都为单一民族村,较有代表性,这7个边境村分属滇缅、滇老边境,7个边境村的行政所属、民族成分及问卷发放回收情况如表1所示。^{①②}

表1 云南边境7村及问卷收发情况

¹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BMZ079)

作者简介:张曙晖(1972—),男,云南大理人,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学、民族社会学研究。

² ①文中的资料除特殊注明外,其余都来源于2013年至2016年的问卷数据及访谈资料。

边境	州（市）	县（市）	调查点	民族	发放问卷（份）	收回有效问卷（份）
滇缅边境	保山市	腾冲市	猴桥镇猴桥村委会长塘自然村	傈僳族	29	29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盈江县	铜壁关乡三合村委会诗别自然村	景颇族	30	30
		瑞丽市	户育乡户育村委会雷贡自然村	德昂族	24	24
	临沧市	镇康县	军寨佤族拉祜族傈僳族德昂族乡忙吉利村委会新半山小组	佤族	60	60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福贡县	匹河怒族乡托坪村五湖小组	怒族	27	27
滇老边境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景洪市	基诺乡司土村委会回鲁小组	基诺族	70	70
		勐腊县	尚勇镇尚勇村委会（三组）	傣族	46	46

二、边境少数民族教育转向的困境

（一）受教育水平偏低的代际效应影响明显

由于历史原因，边境村民受教育水平低，整体素质较低的情况至今仍很突出，尤其是家长的低教育水平严重影响着子女的教育水平，难以提高边境农村的整体文化素质，低水平的受教育状况严重制约着教育转向。云南边境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比较缓慢，接受汉文化教育的人占少数，自现代教育发展以来，尽管实施了普及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等国家政策，实现了“两基”，但由于边境少数民族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以及较为缓慢的经济增长的制约，直至现在包括家长及适龄儿童在内受教育水平仍然较低，农村整体文化素质偏低。这种状况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父母的教育水平是影响子女受教育水平且导致群体文化素质偏低的重要因素。首先，相较于低教育水平的父母，高教育水平的父母更重视教育，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更高；其次，父母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文化资本也相对较高，能够为子女创造更好的教育环境；此外，父母的高教育水平往往转化为较高的家庭经济收入，因而相较于低教育水平的父母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1] 在我们所调查的对象中大部分是学生家长，他们的受教育水平大多只有小学学历，甚至还有很多是文盲，家长们的受教育水平明显地影响着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可从下述问卷数据看到这种状况。

腾冲市猴桥镇长塘自然村是一个傈僳族边境村，共 34 户，距中缅边境线 15 公里，主要以种植草果为生活来源。在接受调查的 29 人中，小学文化程度的达 18 人，占了被调查对象的 62.1%；初中文化程度有 6 人，占 20.7%；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有 3 人，占 10.3%。

再来看长塘村的孩子们接受高中教育及大学教育的情况，问卷结果同样表明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29 户调查对象中，26 户

家中没有小孩正在接受高中教育，占 89.7%，只有 3 户表示家中有 1 个孩子正在接受高中教育，占 10.3%。

29 户调查对象中，27 户家中没有小孩正在接受大学教育，占 93.1%，只有 2 户表示家中有 1 个孩子正在接受大学教育，占 6.9%。结合访谈，长塘村现有 15 户家庭的孩子正在接受初中和小学教育，已经高中毕业的学生只有 3 人，有 2 人正在北京和昆明读大学。

总体上看，长塘村大部分家长都为小学、初中学历，孩子们的学历也是以小学初中居多，高中、大学学历非常少。这样的情况在边境 7 村中普遍存在。

（二）传统教育观与消极教育观占主导地位

长期以来，边境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相对封闭，边境少数民族村民接受的大多是口耳相传的家庭式或村社式传统生计及人际交往教育，于现代教育观念则几乎闻所未闻。自现代教育发端后，传统的教育观念仍固守于边境农村，受现代化、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边民的教育观念虽然有了一些改变，但“读书无用”等消极思想观念也随之席卷而来，因此，在传统教育观与消极教育观的双重制约下，今天的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不重视教育的问题，很多孩子初中毕业后就不再继续上学，而是选择打工或者结婚，同时也是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加之受大学生就业困难风潮的影响，边境农村的教育投资风险增大，经济发展本来就不利的边境农村地区更没有能力再为教育加大投资，即使是经济发展状况有明显提高的地区，也对教育重视不够，教育期望值偏低，在这样的局面下，教育转向举步维艰。

在尚勇村访谈时，边境村民普遍流露出读书无用论的认知：认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即便做了公务员，一个月的薪水不过三四千元，远不如割橡胶赚钱，况且绝大部分还做不了公务员，找个工作都不容易。

在长塘村访谈中我们得知，由于大多数父母的文化程度偏低，因此，他们往往无法对自己孩子的学习进行辅导，也没有多少家长过问孩子的学习情况，导致大部分孩子的学习成绩很差。家长们认为，孩子读多了书，体力反而不行，就帮不上家里的忙，而且现在大学毕业生工作也难找，不如早点回家帮父母干活，还省下一笔费用。

在访谈中，五湖组中有很一部分人表示希望孩子不是农民就可以，孩子上学能上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在访谈中，大部分人认为上学读书本是一条改变命运的道路，但在村民看来，学历既与收入没有直接联系，又与工作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教育在村民心目中的价值也自然受损。

（三）有限的经济收入难以支撑教育投入

云南边境农村至今天仍以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为主，产业结构极其单一，几乎没有什么支柱产业，尚未形成自己的特色经济，边民增收缓慢，在有限的收入境况下，大多数边境村在教育投入方面往往捉襟见肘，尤其是高中之后的教育投入更是难以为继，教育转向若没有经济快速增长的支撑则难以实现。2000 年开始云南省实施“三免费”教育，2005 年之后改为“两免一补”教育。2001 年 2 月 12 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各地陆续开始为学生提供营养餐，等等。这些措施大大减轻了孩子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所承受的教育负担，但在高中以及之后，大部分教育费用还是要靠家庭来承担。由于边境农村收入一直处于缓慢增长的态势，大部分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负担孩子高中以上的教育费用。

长塘村傈僳族农户收入大部分依靠种植草果，但是草果苗种下去之后，挂果至少需要三年时间，因此，在这三年之内，经济收入不会有大的变化。虽然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免费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但长塘村的大部分家庭仍觉得教育支出所占比过重，承担教育费用负担重。在 25 户调查对象中，有 8 户表示负担很重，需要借款读书，占 32%；11 户表示能支付，但

占家里收入的比例大，占 44%，也就是说 76%的人表示教育费用负担重。有 6 户表示能支付，占家里收入比例小，仅占 24%。结合访谈得知，这些负担压力主要来自家里有初、高中学生及大学生的家庭中。

在诗别村，大多数家长表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让孩子学习更多的知识和专业技能。但问到让几个孩子去学校接受教育，这就与家庭收入状况有很大关系，多数家庭表示只能供一个孩子接受教育，有两个及三个以上的孩子接受教育的家庭比较少。

(四)机械执行“撤点并校”，后遗症严重

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为了提高农村中小学办学质量，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撤点并校”行动，大量的农村小学不断消亡，很多地方由于对国家政策的片面理解，通过一刀切方式简单执行中央政策，2006 年之后“撤点并校”负面影响逐渐出现。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也毫无例外地加入了机械执行中央教育政策的行列，由于大规模的“撤点并校”，边境教育出现了诸多严重的后遗症，加剧了边境教育转向的困难。

五湖小组所在的托坪村只有一所色德小学，学校里只有一个代课教师和 17 个学生，小学里只设有一至四年级，四年级之后，孩子们就要到乡里就读，学生上学路途远，交通又不方便，这给学生、家长造成了很大不便。这种状况的出现都是由“撤点并校”导致的，腊甲底、五湖和托坪的村小学在政策影响下因集中办学的要求而被撤销，适龄儿童都到匹河中心完小就读。撤点并校的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教育资源，但实施后也出现了许多问题，结合访谈，比较突出的问题有：第一，增加了家庭的负担。撤点并校之后，许多学生要到离家较远的学校上学，因而产生了过去没有的交通费用。同时，许多学生由于离家太远，需要在学校寄宿，又产生了伙食费等额外的费用。这些费用增加了家庭的负担，甚至有些家庭由于无法支付费用，孩子不得不辍学在家。在访谈中还有村民表示，到乡里去上学给学生、家长带来了很大不便。第二，交通、人身以及食品存在安全隐患。撤点并校之后许多孩子要到离家较远的学校上学，这个阶段的孩子年龄又比较小，因而容易在上学、放学往返途中出现交通安全、人身安全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也是学生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孩子不在父母身边，教师又很难掌握和监控学生的饮食情况，加上媒体屡屡曝光的学校食堂食品安全问题也引发了学生家长对学校食堂食品问题的担忧。第三，教师任务加重，很难吸引优秀人才。在边境地区任教，条件本来就艰苦，合并办学之后，大多数学生需要在学校内寄宿，由于班额增加，教师的工作量随之加大，加之这些孩子年龄较小，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还要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这样一来，边境农村学校教师工作的繁重容易使人避而远之，吸引人才也就变得异常艰难。

(五)双语教学薄弱，边境教学质量整体偏差

云南边境地区教学质量整体偏差，在访谈中，多数人提到，语言障碍、家庭教育、教师素质等都是导致教学质量差的原因。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双语教学、学校管理、家庭辅导及家长与老师的沟通等方面：第一，双语教学薄弱，由于语言障碍导致教学质量低下；第二，学校管理松散，学校对学生的要求不够严格，管理制度形同虚设；第三，大部分家长表示，压力再大也要供孩子读书，但不知道该怎么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不知道如何与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也没有能力辅导孩子的学习，对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情况不太了解；第四，家长与老师之间的沟通不好，没有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沟通制度。若不重视解决这些制约教学质量的因素，实现教育转向无从谈起。

在诗别村访谈时，大部分村民表示，自己的小孩从小就说景颇话，进入小学读书之后，仍然以讲景颇语为主，而老师们基本都用汉语讲课，导致孩子们上学听不懂课程内容，老师也不清楚孩子们的学习效果，久而久之就造成了教育教学质量偏差。村民们表示，应该大力开展双语教学，一方面可以提高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另一方面又可以起到保护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作用。

长塘自然村小学生就读到猴桥完小，中学生就读到猴桥中学，由于长塘村的孩子很少上过学前班，大部分直接上小学一年

级，不会讲汉语，因此，基本听不懂老师用汉语讲课，老师也不知道学生听懂了没有，几个为数不多的傈僳族难以改变这种状况。

三、实现边境少数民族教育转向的路径

边境少数民族教育发展要从传统僵化的教育模式转向主动选择综合创兴的教育模式。在教育转向中，必须突出边境农村的主体性，与中央政策有机结合、互融相生，充分发挥边境资源和优势，增强经济实力为教育转向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同时，深入分析边境特色，实现边境教育创新。

(一)抓住“全面改薄”的契机，为边境教育转向积累条件

“全面改薄”是国家针对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的专项资助计划，要抓住此契机，充分把“全面改薄”与边境教育实际相结合，为边境教育转向积累条件。2014年，为实现《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计划，财政部、教育部下达了薄改计划中央专项资金310亿元，资金额度比2013年提高50.77%。结合中央规划，云南省随之发文《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全面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步伐，是全省义务教育工作在新时期的必然趋势，是未来5年重中之重的工作任务。其中，专门指出主要面向农村，立足改善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不得将教育资金资源向优质学校集中，从规划、资金、政策等方面，对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特殊困难地区、边境地区的薄弱学校给予重点扶持的原则。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将规划期确定为2014~2018年；实施范围覆盖全省129个县(市、区)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兼顾县镇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全面改薄”必须要结合云南边境实际，做好下述工作：第一，缩短督查周期，积极跟进项目进度，形成政策良性循环模式；第二，针对县级财政困难程度，合理调整配套资金比例，保证项目顺利落实；第三，建立真正的督查问责机制，将重心放在问责机制上来，才能切实保障项目如期按质按量地实施；第四，积极将上述政策，尤其是以项目形式扶持改薄的政策充分宣传到位，并主动为边境一线义务教育学校规划项目争取资金、人力、智力和物力的支持；帮助村民挖掘可利用的政策资源，例如加大各项教育政策的宣传力度，让村民知道自己在教育费用上遇到困难时，清晰地明确如何利用政策、享受政策，从而得到帮助。

(二)加快边民经济增收，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应充分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为边境教育转向奠定经济基础

云南边境少数民族教育转向的制约因素之一是边境地区经济收入水平偏低，比如景洪市勐腊县傣族尚勇村董宗保小组，2013年，年人均纯收入才有1378元；怒族五湖小组，2014年，年人均纯收入只有2673元。因此，必须要打破边境传统的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的单一生计模式，充分发挥边境资源优势，加大对边民的培训力度，创新边境就业模式，建构以现代支柱产业为核心、其他经济方式为辅助的边境立体组合生计模式，大幅增加边民收入，为教育转向奠定经济基础。

同时，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应充分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考虑到地区城乡经济水平的差异，加大对贫困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教育经费扶持力度。一是认真落实“两免一补”政策，足额拨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使享受农村义务教育贫困寄宿生生活费学生能安心读书。足额拨付学前教育助学补助资金全面，保障学前教育教学任务的完成。切实保证国家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贯彻执行。二是切实执行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中职学校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等政策，让贫困的家庭人员及时拿到奖助学金完成学业。三是做好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要健全教育收费管理制度，深入开展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督导各项惠民政策落实情况。除此之外，还需进一步加大对边境少数民族教育投入的政策倾斜，多方筹措教育经费，积极争取社会团体、各种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的投资及捐助，同时，要对各类经费实行专款专用，统一安排，确保经费使用的有效性。

(三)转变教育观念，改革办学体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为边境教育转向扫除重点障碍

教育转向必须要抓住重点，走综合创新之路，教育观念转变、办学体制改革、职业教育发展要放在综合创新重中之重的位置。在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农户的思想比较保守，对孩子的教育大多不关心，觉得读书没有多大的用处。因此，一方面需要村干部对他们宣传读书的用处，另一方面，要提高办学质量，增强学校教育对边境民众的吸引力，让他们认识并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积极探索多元办学模式，坚持政府为主导，吸收社会力量和社会资金参与办学，鼓励民办教育的发展，把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纳入整体的教育体制中，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目前，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在教育方面存在着两个极端群体：一是那些想读书、能读书，但是苦于家庭负担过重，且毕业后就业困难的群体；二是那些受教育水平低，已经过了九年义务教育年龄的中老年群体。对这两部分人，应该通过发展职业教育的手段，让他们有一技之长，先就业，先独立。特别是对第一个群体，国家政策要正确引导，积极鼓励他们接受职业教育。职业技能教育投入低、时间短、针对性强，能较好地满足这两个群体的实际需要。^[2]

(四) 动员社会支持，发展学前教育，为边境教育转向提供正确的切入导向

实现教育转向，抓好幼儿教育是重要的一环，没有幼儿教育或幼儿教育存在短板，会导致后续教育偏向或整体教育质量偏差。我们的调查表明，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很多自然村都没有幼儿园，比如在怒江托坪村就没有幼儿园，部分家长会把孩子送到乡里去上幼儿园，但有的孩子只能等到年龄合适后直接上一年级。因此，必须要动员社会支持，例如借助慈善组织等一些民间组织的力量，吸引公益组织，利用公益组织的力量加上地区政府、当地群众的共同努力，发展学前教育。学前教育是教育中重要的一环，学前教育要帮助学生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规范学生在学校的行为，从而为进入小学做准备，在学前教育阶段，让孩子的智力因素得到科学的开发，非智力因素得到良好的培养。

(五) 重视学生安全，消解“撤点并校”后遗症，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疏导，为边境教育转向提供安全环境

针对撤点并校带来的安全问题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完善，一是要重视学校的食品安全，建立学校食品安全监督体系；二是要重视学生的交通安全，对需要乘车往返于学校的学生做出统一的交通安排，并对交通费用给予适当补贴。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由于青壮年人外出务工，部分父母选择把孩子留给年迈的父母照顾，这种隔代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弊大于利。在这方面，作为父母首先应该加强与子女的联系和沟通；学校方面则要加强留守儿童的心理疏导。

参考文献：

[1] 谢宇，张晓波，等．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3)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 董磊磊．边境民族社区民生问题研究 [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13．